

THE STUDY
ON
ASIAN FOLKLORE

陶立璠◎主编



亚细亚民俗研究

第三辑



學苑出版社

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三辑

——亚细亚民俗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

主 编：陶立璠

副主编：贺学君
苑 利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细亚民俗研究 (第三辑) / 陶立璠主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6

(学苑学术论坛)

ISBN 7-80060-020-3

I. 亚… II. 陶… III. 风俗习惯 - 亚洲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K8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159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高碑店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9.5 印张 230 千字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20.00 元

钟敬文致大会的贺信

大会主席，
各位与会代表，
各位国际学术同行：
你们好！

值此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三次国际学术会议召开之际，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民俗学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韩、日三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三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建设了各自的民俗文化宝库，丰富了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这是我们足以引为自豪的。

二战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韩、日民俗学者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你们又把自己的新鲜经验和学术成就带到中国来，与中国同行切磋学艺，或开展亚太国家民俗学界的国际合作研究，这不仅推动了民俗学这门民众科学的前进，而且促进了中、韩、日比较民俗学的发展，扩大了亚洲国家的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本次大会的召开，正是这项工作向纵深发展的标志！我为之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已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不能前去韩国参加盛会，但我在一衣带水的中国，收听着你们传来的学术喜讯，一并让与会的中国代表带去我这个民俗老学人的一份遥远、真诚的致贺！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祝愿中、韩、日三国民俗学者的
学术友谊万古常青！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钟敬文
1999年11月18日于北京，时年九七

目 录

钟敬文致大会的贺信	(1)
亚洲国家的动物、马与	
背架民俗的文化分析与比较	杜 西 (1)
草原游牧民“畜群成年礼”初探	桑布拉·敖力布 (12)
蒙古人与马：观念及其文化阐释	郝苏民 文 化 (27)
论中国云贵高原马帮与马帮文化	黄建明 (39)
各国及各民族的马肉文化比较	(韩国) 金天浩 (48)
马与厄运习俗	(日本) 樱井龙彦 (65)
杀马的祭礼仪式	(日本) 小岛瓊礼 (75)
马的民俗与基督教——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对巡礼地	
WEINGARTEN (德国) 的事例	
及其相关的描述	(日本) 河野真 (80)
陶瓷的图纹与民俗	
——关于日本濑户地区马目纹的考察	刘京宰 (86)
蚕神信仰中的马头娘信仰	陶雪迎 (95)
日本的异类婚姻故事	(日本) 樋口淳 (109)
韩国民俗文学中的马	(韩国) 金善丰 (117)
中国民间叙事中的马	程 蔷 (124)
明代四大奇书传说里的马话语	董晓萍 (128)
中国俗语词典中的马文化	庞建春 (133)
有关马的突厥语族民间文学	(日本) 西脇隆夫 (137)

韩国堂神话与马信仰的实在意义	表仁柱 (149)
韩国马球的历史及其发展面貌	郑亨镐 (163)
韩国的牛游戏类型与性格	(韩国) 韩阳明 (175)
韩国动物舞蹈的基础结构	(韩国) 李爱珠 (182)
中国民间剪纸中的动物信仰	陶立璠 (188)
谈鄂伦春族熊图腾兼及动物崇拜	吴雅芝 (201)
龟的儿歌及其诅咒力——围绕《三国遗事》(卷二)	
所载的两首歌谣	(日本) 永池健二 (210)
中日风筝民俗文化中动物及相关	
民间信仰之比较研究	程 群 (218)
圣像发现谭中动物的功能	(日本) 田尻阳一 (225)
日本人对狗的认识考	(日本) 丸山显德 (235)
韩国的虎信仰——虎在文化史上	
的意义	(日本) 依田千百子 (241)
越南得乐省姆依族人	
祭象神的礼俗	(越南) 吴德盛 阮翠鸾 (251)
江南水乡的龙文化	金 煦 (259)
麒麟——中国民众生活中永远的吉祥物	尚 洁 (268)
李朝时代的年画	(日本) 井本英一 (276)
背架与扁担——山地居民与平原居民的选择	陶立璠 (286)
中国川东北地区背具运输习俗研究——	
对四川省巴中地区南江县背架、	
背兜的实地调查报告	庞建春 金镐杰 (294)

亚洲国家的动物、马与背架民俗的文化分析与比较

北京师范大学 杜 西

1999年第3届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年会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亚洲各国的马文化与动物民俗”，一个是“亚洲的背架民俗”。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4个国家的民俗学者参加了大会，共提交论文43篇。会议就两个主题分别进行了学术报告和交流。

11月20日—21日，在韩国汉城召开第一阶段学术会议，主题是“亚洲各国的马文化与动物民俗”。会址在韩国中央大学综合文艺艺术会馆。此次大会由韩国中央大学、韩国民俗学研究所和江原道民日报社承办，韩国农协中央会杨口郡支部、杨口背架游戏保存会协办并资助。

本届年会的主办单位是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在开幕式上，中央民族大学的陶立璠教授、韩国中央大学的金善丰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樱井龙彦教授和越南社会科学院民间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阮翠鸾分别代表本国的亚细亚国际民俗学会分会致词。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钟敬文教授给大会发去了贺信，韩国民俗学会原会长任东权教授和韩国比较民俗学会会长崔来沃教授到会祝贺。

参加会议的中方民俗学者共11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江苏苏州博物馆和天津民俗博物馆。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参观了韩国民俗博物馆和杨口背架民俗

文化展示，学者们对韩国保护民俗文化的措施和成绩深有感触。

本次年会把“动物”、“马”、“背架”作为专题给予考察，实际上涉及了广泛的民俗学研究领域和亚洲民俗文化交流史的内容。论文的话题颇多，但由于主题集中，能够对以往许多研究方面的成果加以再认识，发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切入点和比较研究的新视点。这种研讨，小中见大，有针对性，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

一、亚洲民俗中的马及动物 民俗的文化分析与比较

中、日、韩、越南等国都有长期的农业社会历史。农业文明的一个历史产物是动物民俗。就中、日、韩三国来说，还有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共有文化现象：马民俗。但马民俗所涉及的三国的民族资料和地方资料还有所不同，所以民俗学者又创造了一个方便使用的词汇——“马文化”。对“马文化”的概念的界定，从三国民俗学者的论文看，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动物民俗中的一类，即本意；一是指驯马人和骑马人的民俗，即引申意，指与马有关的社会行为的探讨。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存在着“马背民族”相互文化往来的历史“情结”，所以都有话说。这三国学者的论文，大多谈“马”；少量的谈到了“牛”、“熊”和“龙”之类。越南学者来自东南亚，他们不说马，说“大象”，因为在那里的动物民俗中，大象是百兽之王，在民俗文化的地位上，南方大象的地位相当于北方的骏马。

在这个前提下，论文的话题分为六类，分别进行了专项分析和比较。

（一）马及动物的物质文化

对动物民俗的注意，早在 100 年前就开始了。国际公认的世

界民俗学之父卡尔·科隆 (Kaarle Krohn, 1883—1933) 最早为了研究人类文化而发明了动物故事分类法 (AT1—5 型), 奠定了民俗学比较研究的基础^①。本次亚洲国际民俗学者讨论动物民俗的一个显著话题是动物民俗的物质文化, 即把关于动物的人类物质创造纳入到精神文化中来分析, 这一变化, 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百年来国际民俗学的进展。

韩国文化财研究所郑燾培的论文《先史时代养马和驭马技术的发展》, 从考古学的角度, 追溯亚洲人创造马物质发明的由来, 指出, 在这些国家中, 马受到重视的原因, 起初是因为马是游牧民族所依赖的运输工具。后来马从游牧、狩猎的工具, 跳跃到军事战争和文化教育等其他领域发挥作用, 是靠了骑马术和驾车技术的出现, 特别是两者的结合。经过这个转变, 有关马的物质发明, 就变得多而迅速了。这些发明, 体现了亚洲人在用马的观念和方式上的纵向历史变化。韩国马事会、马事博物馆崔公镐就马具做了横向微观探索, 论文题为《韩国马具的特征》。

马还是可食性肉类动物, 韩国汉阳女子大学金天浩研究了吃马肉的习俗, 她在论文《各国及各民族的马肉文化比较》中说, 从卫生学上看, 马肉嫩, 可生吃, 无菌, 营养价值很高, 日本、韩国、法国等民族都有吃马肉的习惯。蒙古人最爱马, 轻易不肯食用, 但据记载, 他们在古代军事出征时, 带四匹马, 其中有一匹备用, 留待危机时充饥, 或作越冬食品。中国古代药学名著《本草纲目》把马肉中的肚子等部位列为药用品, 也是一种食疗的观点。在东亚, 马肉食法分烧烤、生吃和吃马肚三类, 出现了名小吃, 丰富了饮食品种。

^① 卡尔·科隆 (Kaarle Krohn) 于 1886 年出版了《芬兰民间故事第一集: 关于动物的故事》。不久又与人合作, 出版了《皇家故事》第一部分。他主要研究狐狸故事, 从中发现了不同的故事类型。他的工作, 奠定了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态度。

（二）马及动物的民间信仰

日本名古屋大学樱井龙彦在论文《马与厄运习俗》中提出，在日本古代的咒术中，已有使用马消罪避灾的习俗。他分析了用马禳灾的六个仪式个案：①神奈川县横浜市本牧神社于农历6月15日进行“马流”和爱知县宫布水法地区于农历8月1日举行“芝马祭”，采用让灾祸顺水流走的做法，这类仪式中的马是用芦苇做成的。②一些人认为疫病和害虫是骑马过来的。③一些地区农历6月15日祭瘟神牛头天王，叫祇园祭、天王祭、在拜牛头天王的“祇园御灵云”里出现马。④2月8日，在送瘟神等灾祸的仪式里，有用稻草做马，牵到道祖神处的风俗。⑤爱知县海部郡蟹江町的“祇园御灵云”的须成祭里，有画在神坛上的神马。⑥七夕马（七月七日）和八朔马（八月初一）与驱逐疫病有关。作者认为，在日本禳灾时多用人形、马形和舟形三种东西，中、韩两国一般多使用舟形，但也有用马形的。

同题研究有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生刘京宰的《陶瓷的图纹与民俗——关于日本濑户地区马目纹的考察》，他搜集到二、三百个日本的陶盘，上有画着许多马眼睛的纹线。他指出，这种花纹，来自日本人的神马信仰，马目盘经常被挂在日本剧场等木建筑的门口，用来防灾和祈福。韩国全南大学表仁柱的研究角度也与樱井异曲同工，他提出，韩国马信仰的特征是：灵验、神异、戒世和义气等。马像的数量和材料，各地都有差异。在村落信仰里，将马奉为神而祭祀，大概是在朝鲜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从出土祭祀遗址和遗物来看，马（土马）的功能有驱鬼、作为牺牲的供品、作为奉献给神灵当坐骑的功能（《韩国堂神话与马信仰的实在意义》）。日本爱知大学河野真教授的《马的民俗与基督教——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对巡礼地 WEINGARTEN（德国）的事例及其相关的描述》，指出了这种动物信仰在日本影响深刻，已渗透到外来的西方宗教当中，出现了一些混合说法。

学者们也对其他动物崇拜做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吴雅芝《谈鄂伦春族熊图腾兼及动物崇拜》一文，对中国北方的鄂伦春民族的熊信仰等做了详细介绍。作者具有本民族生活的经历和感受，谈到一些本民族的动物知识和民众认识。日本学者依田千百子《韩国的虎信仰——虎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越南社会科学院民间文化研究所吴德盛《越南得乐省姆依族人祭象神的礼俗》对问题有深入的论析。日本花园大学丸山显德的论文研究狗民俗。他说，中、日、韩都有“忠诚的狗”的观念，但在印度，狗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东西。作者探讨了日本人在不同时代对狗的评价的变化过程。如奈良时代，高度赞扬狗的忠实品格。平安时代以后，受佛教影响，认为狗有超凡的能力，可以看到恶魔的世界，给人以帮助。江户时代，鉴于从前对狗的忠实性的过分肯定的反感，又认为它缺少判断力，这种见解与当时日本批评儒教的倾向有关。在民间传承里，狗被当成与“他界”沟通的媒介（《日本人对狗的认识考》）。

（三）马及动物的岁时民俗

一些学者发现，动物民俗与农业岁时节令有关。中央民族大学桑普拉·敖力布的论文《草原游牧民“畜群成年礼”初探》指出，在牧民社会中，对已成年的牲畜要施行“耳记”礼、“印记”礼、割礼，实施的时间，有固定的季节期限，目的是加强畜群管理，确定牲畜的所有权，促进草原的畜牧业稳定发展。日本冲绳琉球大学小岛瓊礼研究类似的问题，论文题目是《杀马的祭祀仪式》。

农耕岁时活动中的一个传统项目是农业娱乐游戏。韩国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一位是中央大学的郑亨镐，论文是《韩国马球的历史及其发展面貌》。他说，击球游戏自唐代传入韩国，再传入日本，从传承过程看，可发现岁时游戏在不同的传承群体中的变迁。在韩国，这种游戏分为马上击球和地上击球两类。传承群

体由王室变为武臣、军队、士大夫子弟、青年武官。到朝鲜时代末期，击球已变为民间娱乐，击球的场所由过去的宫廷王室变成了野外村落空地。

另一位安东大学的韩阳明提交了《韩国牛游戏的类型和性格》的论文。据他介绍，韩国斗牛游戏可分为竞争性的和娱乐性的两种。竞争性的包括斗木牛、斗牛；娱乐性的包括喂牛游戏和牛游戏巫术。不同的牛游戏分别集中于正月或八月。正月是一年农耕开始的准备期，主要进行占卜，做祈祷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牛游戏具有咒术性质。同时，一个地区共同体的大部分成员都参与这类游戏，目的是刺激大地和植物的生命力。八月的牛游戏是在一年农事结束后的庆祝时举行的。通过对八月牛游戏的考察，可以探究牛游戏与稻作农业的关系。每年的斗牛和喂牛游戏中，牛象征着一个村的农业生产能力。文中用“缺乏——解除缺乏的要求——解除缺乏”这一结构图，来表示喂牛游戏的全过程，即“饥饿的牛——雇农要求解决牛的饥饿——地主的承诺”。但作者指出，这只是喂牛游戏的表层含义。从游戏的两个主体，即雇农和地主沟通的需要看，饥饿的牛，是沟通两者的象征性媒介。在喂牛游戏中，地主提供丰富的饮食，雇农进行欢庆活动，彼此实现某种交换，由此解除缺乏。这才是喂牛游戏的实质所在。

（四）马及动物的民间叙事

本届年会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关于马和其他动物的民间叙事，论文有 11 篇。从体裁看，使用了史诗、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等多种资料，它说明，20 世纪世界民俗学的诸多进展，给人们积累了新的对话基础。

这次大会研究民间叙事的一个特点，是对民间叙事进行民族志的文化分析。在掌握资料比较充分的前提下，也有少数学者对马故事和其他动物故事的母题做了传播史的比较研究，但在下结

论时，持谨慎态度。

韩国中央大学金善丰强调文化象征的分析。他在论文《韩国民俗文学中的马》中提出，马的象征性载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故事中的马，一类是俗语中的马。民间故事里的马，有的象征宇宙力，有的象征灵魂的使者等。各种散见于神话中的白马、黄金马、黑马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有时马还能预示天君的诞生或国家的灭亡。在《三国史记》等历史记录中，马是古代仪式里重要的牺牲，象征着天和丰收之神、男性的活力和精力。俗语中的马，象征性也很丰富。总之，在韩国文化中，马的象征意义包括神圣、辟邪、权威、天君下降、男性、灵魂使者、祭物、巫神、吉祥等。

西北民族学院的郝苏民擅长蒙、回、藏等多种民族语言，又曾长期在牧马地区生活，具有本民族的生活经历和调查感受，在研究“马文化”上得心应手。他的论文《蒙古人与马：观念及其文化阐释》，提供了大量的蒙古英雄叙事诗、赞词、祝辞和蒙古文化史资料，从语言与文化的多视角、对蒙古族的马观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化剖析。

其他学者也使用了相关的文学资料，不同的是，在文化分析上，各有新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蔷的论文《中国民间叙事中的马》提出了一个观点：民间叙事既是民众创造的一种精神产品，也是民众的日常行为方式。从行为方式上考察马叙事的意义在于，民众谈马的文化含义，学者只看文本，是无法给予比较全面的诠释的。在本文中，作者着重分析了马的神性模式和人性模式，认为，马之所以能够成为民间叙事中的一个文化意象，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相当密切。我们知道，过去对这一层面的内容，注意不够，因此对民间叙事的研究，多偏于类型形式，在学术用语上，也养成了习惯，说到民间叙事，必缀以“文学”二字，却掩饰了对它的群体行为意义的忽略。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董晓萍的论文《明代四大奇书中的马话语》，以华北地区的民间传说为资料，把分析重点放在民间讲述人的讲述态度和讲述语境上。作者指出，华北在历史上一直是汉族与北方马背民族的英雄豪杰竞相驰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舞台，长期以来，围绕着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群。这一民俗现象的出现，有汉族的阶级文化史根源和佛道思想的渗透，也有汉族向北方民族学习驭马、赛马技术的原因。华北民众的固有文化与异民族高超的驭马技艺相结合，提高了生产力和军事战斗力，也丰富了民俗生活。

从经、史、子、集等其他中国古代文献中挖掘民间叙事资料的，有苏州民俗博物馆金煦的《江南水乡的龙文化》、日本专修大学樋口淳的《日本的异类婚姻故事》和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生陶雪迎的《蚕神信仰中的马头娘信仰》。金煦的论文，阐述了“龙”崇拜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生途径。后两篇论文，从动物民俗的角度解释一个蚕的传说，特别是从马民俗的视角，重新透视蚕，抽取出了“女性”叙事这一中介因素，这在关于马头娘传说的民俗学研究中，还不多见。

采用谚语、俗语、歌谣和民俗文献资料研究马和其他动物民俗的论文有4篇，它们是：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西胁隆夫的《有关马的实感语族民间文学》、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田尻阳一的《圣象发现谭中动物的功能》、北京师范大学庞建春的《中国俗语辞典中的马文化》和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永池健二的《龟的儿哥及其诅咒力——围绕〈三国遗事〉所载的两首歌谣》。永池健二的观点是，柳田国男曾提出，以童谣的形式，与看不见的神灵说话，能起预兆作用。但永池健二没有继续讨论：童谣是否属于一种人与动物直接说话的文体？

（五）马及动物的造型技术

民间信仰和民间文艺都属于民众创造的无形文化。日、韩等

国的民俗学界还很重视民间有形文化的研究。在这次年会上，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研究造型艺术的成果。中央民族大学陶立璠的论文研究民间剪纸中的造型艺术及其文化属性，题目是《中国民间剪纸中的动物信仰》。他把民间剪纸分成十二生肖动物系列、吉祥动物系列、生活系列三类，再从造型物的传承者、选择的物质材料、造型功能及其村落表演中，分析它们所承载的文化成分。天津民俗博物馆尚洁的选题与此相似，也研究剪纸，论文题目是《麒麟——中国民众生活中永远的吉祥物》。尚洁侧重历史象征性的研究，主要观点是，剪纸中的麒麟形象，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赋予儒家理想人格的虚拟动物，它在民间流传，又被赋予了奇异机会的期待思想。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博士生程群探讨了中日风筝中的动物造型意义（《中日风筝民俗文化中动物及其相关民间信仰之比较研究》）。

有两位学者研究绘画中的马造型。日本桃山学院井本英一的《李朝时代的年画》一文，首先提到了中国岁时风俗的影响，他引用了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等著作，说中国在正月里有贴年画的习俗。他还举出韩国洪锡谟《东国岁时记》（1911年）和金迈淳《溯阳岁时记》，说韩国民间和宫中也有将鸡虎画贴在墙上辟邪的，及在正月初一给国王进献岁画的习俗。他说，在日本的绘画中，马和人一起出现，也是表现风俗生活的。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李源福在《韩国造型艺术中的马》中提出，在亚洲国家的美术造型中，马是生命力比较强的动物。韩国的马画原来是套用中国画，到了朝鲜时代，才出现了韩国自己的风格，有了带山水风的马画。

被誉为韩国无形文化财的著名民间舞蹈家、汉城大学李爱珠的论文研究民间的动物舞造型，她说，韩国的动物舞蹈有三类：一是使用动物名称来命名的舞蹈，二是使用动物名命名的舞蹈动作，三是象征性地使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舞蹈。动物舞蹈的属性

有：神圣性、辟邪性、日常性、性属性和游戏性。

（六）使用马及动物的社会组织

这类题目，从民间社会行动出发，反观马民俗的形式和内容。中央民族大学的黄建明以家乡云南的马帮组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马帮的社会职能和行业规范。越南社会科学院民间文化研究所的阮翠鸾做了题为《越南得乐省姆依族人祭象神的礼俗》的报告，也谈到当地驯养和使用大象的村落组织。

二、亚洲各国背架民俗的文化分析与比较

背架，是一种运输工具，宽泛地说，可归入农具，属于物质民俗的研究范畴。但背架是死的，不像动物是活的，因而背架民俗主要是在人利用背架的活动中产生的，对它的研究，重点是背者。从各国学者的论文看，对“背架民俗”的概念的界定，也比较单纯，即指制做和使用背架的观念。这方面的论文共有 8 篇，分为 4 类。

（一）山地背架民俗

金善丰的论文《韩国的背架文化》指出，西方人把韩国的 A 字型背架当成典型，称 A - Frame (Asia - Frame)，大概从形状上类推而来。但背架的价值在于它能保存民俗。他的田野调查点在韩国北部的杨口山区，那里保存了传统的背架游戏。他说，背架原是山地农耕生活的发明，但后来又演变出背架的游戏，则反映了人的一种自身需求。人的一生是与游戏分不开的，游戏有野会、击节舞蹈、社会沟通等多种性质。背架还可以用做葬礼仪式的专门工具。它能服务于人的文化需要。这就是背架的两面性。做同类研究的，还有韩国江原道大学的金淑义。

（二）平原背架民俗

陶立璠在《背架与扁担——山地居民与平原居民的选择》一